

從社會互動論唐人「牡丹熱」之文化意涵

陳秀美

德霖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摘要

本文是以「文化」與「社會」的研究預設進入，藉由「社會互動」的詮釋視角，觀察唐人「牡丹熱」之栽種、鑑賞、品評的社會互動行為，及其所形成之「文化行為模式」。「牡丹花」是藥草移植、改良成為觀賞花卉；又被人們刻意栽種成為花中之王，並在競相栽種的社會互動下，形成一股「牡丹熱」的社會風氣，代表富貴的文化意象。準此，本文將藉由社會互動的視角，探討唐代文人對「牡丹熱」的描述、詮釋與評價裡，除了客觀描述「牡丹之美」外，還隱含其主觀認知，反思與批判「牡丹熱」的社會文化現象。這樣的主體認知，正是「牡丹文化」逐漸等同於貴族文化，而「競種牡丹」便成為一種追逐「富貴權勢」的社會行為，並且奠定「富貴牡丹」的文化意涵。

關鍵字：社會互動、牡丹熱、文化意涵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ang-dynasty People's "Fever for Peony"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Chen Hsi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social interacting behaviors and the entailing "cultural behavior modes" resulting from the planting, connoisseurship, and evaluation of peony in Tang-dynasty people's "fever for peony." "Peony," since the Tang dynasty, had been transformed from its original use as a herbal medicine and became a famous flower for leisure-time appreciation. This trend was especially prevalen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hen people planted and cultivated peony in a rage, eventually forming a cultural symbolizing "wealth and good fortune." Based on this, accurate, this article will by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explore the Tang Dynasty on "Peony hot"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in addition to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Peony beauty", but also implied its subjective perception,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Peony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hot" is. This body awareness, it is "Peony Culture" is equivalent to the aristocratic culture gradually, while "competing kinds of peonies" has become a kind of chase "wealth and power" of social behavior, and to lay the "Peony" cultur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social interaction, fever for peony, cultural implications

壹、前言

歷來有關唐代「牡丹文化」之研究範疇，乃屬唐代文學之熟題。因此，首先說明本文乃立基在「文化」與「社會」之相互生成與彼此依存的基本假定上，希望藉由唐人「牡丹熱」之社會現象，重新反思這種從區域性生成與文人社群之愛好，所形成之上至帝王，下至庶民之間的競逐現象，並在生產、累積的過程中，逐漸型塑出「牡丹」之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價值觀念系統，所創造出之「文化」價值意涵。其次說明本文所謂「牡丹熱」是指唐代貴族文人社群，經由集體社會互動的行為，形成社會各階層從競相爭購、收藏、遊賞牡丹等實物之時尚的追逐熱潮推動下，逐漸往意象化，符號化發展，因此書寫牡丹、彩繪牡丹圖騰融入人們的生活中，形成文化傳統中特有的「牡丹文化」。

因此本文預設唐人愛好牡丹的流行熱潮，是經由長期時間與空間，並且集合個人主觀意識與群體社會性共識，所型塑出一種特殊的文化行為模式。這種模式其實在人類的文化社會裡早就存在而且延續著，它跟現代人「趕流行」的一窩瘋行為很相似；然而今日「一窩瘋」的社會現象，雖然也是屬於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的互動溝通、交互反應，且彼此影響的社會性行為，例如「哈日」、「哈韓」熱潮，雖有「一窩瘋」的社會互動現象，但並不一定能轉換出屬於文化傳統中，普遍的文化象徵符碼，或具有抽象的文化意識。換言之，唐人「牡丹熱」是一種經由長期無意識、無特別約定的社會互動下，所型塑出特殊的「牡丹文化」現象，其中存在著人與人，人與群體，或者群體與群體彼此進行互相理解的交往或者行動。

準此，它是「人與人之間交互反應溝通的過程，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過程相互影響，進而創造，維持，改變彼此的行為模式。」¹這種行模式正如顏崑陽〈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的文化原料性、不定式文本再製與價值兌現〉所言：所謂「社會互動」，是指非出於特別約定而是在長期社會文化生活方式的習得、傳遞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鑑賞、品評的群體性社會互動行為。這類的互動行為在並時性與歷時性的文化發展中，被多數人但反覆操作，於是形成一種「文化行為模式」。²不過，本文雖然運用「社會互動」做為詮釋視角，但研究焦點並非在「社會互動」的社會學理論的論證與探討，也不做社會學理論的挪借，而是從唐代文獻史料所記載之有關「牡丹文化」的創生與流變，觀察此一牡丹文化的「社會互動」模式，以及其何以能成為一種象徵「富貴」的文化義涵。這種集體的、狂熱的社會互動中，所呈現之集體意識的成果，透顯出牡丹這個自然物，在長時期無特別約定下，經由其個殊的演化，逐漸形成一種「共相」與「普遍」的象徵符碼。

此外，歷來兩岸學者，對於唐人「牡丹」文化研究不少，如：國內的期刊論文有李雄、李富軒〈國色天香話牡丹〉³，黃崇鐵〈牡丹的吉祥圖意與其象徵意義〉⁴。學位論文有白茹冰《論

¹彭懷恩：《社會學 Q&A》，《風雲論壇》，1998 年 9 月，頁 3。

²顏崑陽：〈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的文化原料性、不定式文本再製與價值兌現〉，第三屆「海峽兩岸中華文化發展論壇」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與淡江大學等主辦，2008 年 8 月 23 日至 8 月 24 日於江蘇省連雲港舉行，頁 4。

³李雄、李富軒：〈國色天香話牡丹〉，《歷史月刊》，206 期，2005 年 3 月，頁 16-19。

唐代牡丹的引種、推廣與興盛》，張麗琴《李商隱牡丹詩之研究》，涂美婷《唐代牡丹文化與牡丹詩研究》⁵。大陸的期刊論文，有田志明、張劍光〈唐代的牡丹欣賞熱〉⁶，張艷雲〈唐代長安的重牡丹風氣〉⁷，陳昌寧〈唐宋間牡丹熱的地理變遷〉⁸，王健〈唐代長安的牡丹熱〉⁹，楊靜〈唐代牡丹詩與牡丹文化〉¹⁰，劉航〈牡丹：唐代社會文化心理變遷的一面鏡子〉¹¹，白茹冰〈唐代牡丹文化初探〉¹²，徐美霞、徐方方〈唐代「牡丹熱」淺析〉¹³……等等與本文較相關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從考證面進行牡丹之自然物的實際考證，也有企圖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描述詩歌與牡丹文化時，無論是初探，或學位的研究論文之研究成果，都是本文的詮釋基礎。

然礙於論文之篇幅所限，本文在材料的擇取與運用上，首先藉由類書的史料記載，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做為重新梳理與釐清花王牡丹的由來，以及「牡丹花」始自唐代開始被從一種藥草移植、改良而成為一種觀賞花卉；尤其在初、盛唐時期的人刻意栽種下，更成為觀賞用的花中之王，同時在大家競相栽種下，也形成一股「牡丹熱」的風潮，於是「牡丹花」成為象徵「富貴」的文化意象等基本認識上，從社會互動探討唐人「牡丹熱」之文化意涵，而非重新論證以上議題的是與非問題。其次，本文一方面選擇中唐社會詩人白居易為例，希望透過白居易之詩歌來反思其批判唐人競逐牡丹之「炫富」與「競富」的「牡丹熱」現象；另一方面藉由晚唐李商隱之詩歌為例，探討詩人藉由「牡丹富貴」之普遍性象徵符碼，轉成運用在個人之「特殊性」象徵符碼的運用義涵。

故本文之論述位置，是想在透過此一集體行為所產生的社會現象，被寫入詩歌作品中，有從客觀描述「花中之王」的美，有從描述士人貴族「炫富」、「競富」等社會互動行為，也有從中唐社會詩人筆下反省當時競富之時弊的批判。所以將從王室貴族、文人名士的愛好，點燃牡丹熱潮與風尚；花師的專業培植與改良，助長牡丹熱潮與風尚；以及唐人競逐富貴之社會互動與「牡丹」之文化意象的成形，探討唐人「牡丹熱」行為中的「社會互動」現象。再從轉變的軌跡，探討中唐白居易之反思與晚唐李商隱之寄情等議題，來論唐人「牡丹熱」之文化意涵。

貳、唐人「牡丹熱」行為中的「社會互動」現象

如前所述，本文預設在唐人發現牡丹的過程中，讓牡丹能從實用性的草藥，變成鑑賞性的名花，是經由許多人的社會參與，如花師的改良與培育，因而引起王室貴族的注意，這樣的注意又鼓舞植物專家的花師們，更加投入培植牡丹的改造工程，於是牡丹從「花色、花香、花姿、花形」等各方面都出現了變化，因此確立牡丹之美與丹之奇；又其美與奇就更加吸引王室貴族

⁴黃崇鐵：〈牡丹的吉祥圖意與其象徵意義〉，《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53期2006年4月，頁22-25。

⁵涂美婷：《唐代牡丹文化與牡丹詩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97學年度碩士論文。

⁶田志明、張劍光：〈唐代的牡丹欣賞熱〉，《雲南教育學院學報》，第11卷第三，1994年6月。

⁷張艷雲：〈唐代長安的重牡丹風氣〉，《唐都學刊》，第11卷(總第45期)，1995年5月，頁17-19。

⁸陳昌寧：〈唐宋間牡丹熱的地理變遷〉，《天中學刊》，第11卷(增刊)，1996年8月。

⁹王健：〈唐代長安的牡丹熱〉，《風景名勝》，2000年7月，頁42-43。

¹⁰楊靜：〈唐代牡丹詩與牡丹文化〉，《荷澤師專學報》，第24卷第3期，2002年8月。

¹¹劉航：〈牡丹：唐代社會文化心理變遷的一面鏡子〉，《學術月刊》，2005年12月，頁58-63。

¹²白茹冰：〈唐代牡丹文化初探〉，《農業考古》，2009年4月，頁58-63。

¹³徐美霞、徐方方：〈唐代「牡丹熱」淺析〉，《傳承》第2期，2010年6月，頁74-79。

與文人名士的好奇與喜愛，在這種互動的過程中，品種改良與種植不易，使其驕貴與難得更加物以稀為貴，然後形成更多人的好奇，更人的遊賞，也讓更多人投入花師的工作。種植牡丹的場域從深山到京城的皇宮、士大夫的宅第、清閒的寺廟，到一般百姓家；這每一次的移植，都引發了人們的社會性互動，也都形成一種群體鑑賞的熱潮與風尚。因此王室貴族的喜愛，讓不易培育的牡丹花不斷被研發，奠定了牡丹為「花中之王」的地位，更使其成為藝術性鑑賞與文人們創作素材。這當中場域轉換、不同階層之人員的投入，以及牡丹多樣與多變的奇與美，都是造成唐代「牡丹熱」之社會互動現象的要素。

故本文從社會互動的詮釋視角看來，在唐人的「牡丹熱」現象裡，隱含著一種互為條件，或相互承接結果的社會行動，培育牡丹者與觀賞牡丹者之間，由個人的行為產生了互動性，於是形成一種互動現象；因此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產生雙向交互作用，或相互影響的社會行動，或社會交往，這正是社會互動之界義裡，所指出的個人之間、群體之間，或個人與群體之間相互影響的模式，於是人類社會形成一種特有的文化價值與意義。故從唐代文獻史料中可以觀察到當時「牡丹熱」的描述，當中除了客觀書寫「牡丹之美」外，還隱含著詩人主觀認知與社會觀察。就如前行研究所言，有「花王」之稱的牡丹，始出於唐代，在唐人爭相栽種、品評、改良「牡丹」的社會互動行為下，塑造了牡丹成為「富貴」的文化意象。然後又在詩人反思貴族追逐「富貴權勢」批判下，牡丹又變成承載競富逐貴之浮誇亂象的代名詞，故從文化發展的成果看來，牡丹之意象被定型為富貴的普遍意象。因此本單元將從其生成與轉變，來論其從自然物到文化產物的流變過程中，探討唐人的社會互動行為，及其所形成特殊的文化發展模式。

一、王室貴族、文人名士的愛好，點燃牡丹熱潮與風尚

在唐代的封建社會裡，王室貴族、文人名士的愛好，是點燃牡丹熱潮與風尚的重要因素。史料顯示，此物以「牡丹」為名，乃始於唐代，歷來學者論牡丹之始出時，大都以段成式《酉陽雜俎》中所言為詮釋依據，故如其所云：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¹⁴

從以上這段史料，我們除了可以看到「牡丹」一名，在唐代之前的歷史中未被提及，它只出現在謝靈運的《謝康樂集》中提到「竹間水際多牡丹」的說法，但我們無法確定謝靈運所言之竹林水中的牡丹，是否就是唐人所言的「木芍藥」之「牡丹」品種。因為段氏在引用謝靈運之語後，並未追加說明是與否，他反而直接引隋朝《種植法》中，並沒有記載「牡丹」種植的方法，做為其間接回應隋朝《種植法》裡的「牡丹」與唐人之「牡丹」無關的看法。這樣的說法在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中亦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¹⁵這說明了牡丹最早並非是以「花」聞名，而是以「藥草」被記載入「本草」類中。然後這段文獻記載直接提到「開元」

¹⁴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頁 185。

¹⁵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百川學海，正光書局，1971 年九月初版），頁 1530。

末年裴士淹出使幽州冀州回長安時，途過汾州在「眾香寺」，得到一窠「白牡丹」，將它移植在長安私第裡。這時看來裴士淹得牡丹之事，尚屬個人賞花階段；但到了「天寶中」已形成長安人爭相奇賞牡丹的社會現象。

此外，舒元興的〈牡丹賦〉序亦有云：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為貴者所知，花則何過焉？天后之鄉，西河也，有眾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寢盛。¹⁶

這段史料點出牡丹因為「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為貴者所知」，所以才會出現「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的結果。由此可知，被「貴者所知」是形成「牡丹熱」的社會互動要素。所以牡丹花不為人知並不是「花之過」呀！此外，舒元興特別強調「牡丹」本生長於武后的家鄉——「西河」。西河的眾香精舍裡重了十分「特異」的牡丹花，後被「武則天」所知，下令移植到長安的宮殿。故此一移植牡丹的動作，讓牡丹花能布長安城「日月寢盛」下，成為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言「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的名花。準此，從以上這兩段文獻史料看來，牡丹從一種草藥，逐漸被重視成為觀賞用花；或因其「花之美」被文人雅士從鄉間移植到長安都城的私第，或因「武則天」下令將牡丹移植長安宮殿，因此形成日後「京國牡丹日月寢盛」的社會現象。

關於王室貴族與文人名士愛好牡丹之情，就如徐美霞與徐方方〈唐代「牡丹熱」淺析〉中，敘述到「皇宮中的牡丹」與「士大夫家的牡丹」時，引〈牡丹譜有序〉中武則天對牡丹的喜愛；引《龍城錄》中寫到高宗皇帝愛好牡丹，因此為觀賞雙頭牡丹，而御群臣設宴吟詩之事；引《松窗雜錄》記玄宗熱愛牡丹，携愛妃連夜觀賞，又命梨園弟子獻樂助興，因為「牡丹」嬌艷芬芳，從朝，午，暮，夜，顏色千變萬化，而且香艷各異，這種豐富的變化特性，玄宗稱其為「花木之妖」。因此每年春天時，玄宗常聚集賓客在沉香亭前賞花，並在這種集體賞花的互動過程，是點燃牡丹熱之社會風尚的由來；引《杜陽雜編》記載穆宗把牡丹種在宮殿前，讓牡丹天天陪伴，可見其愛牡丹之情。引司馬扎〈賣花者〉中寫到牡丹花開時節，府邸主人就會邀請同僚好友飲酒賞花；又引《開元天寶遺事》所載楊國忠在玄宗時期，因其權傾一時，當家玄宗賜予的牡丹花盛開之際，其府邸宴客賓朋滿座等等。¹⁷

可見這種經由上層社會人士的喜好，導致「牡丹花」成為王室貴族、文人名士之間，交際往來之社會互動活動中，遊賞，品評的媒介。因此本為「木芍藥」之俗稱的「牡丹花」，因其花美得特異，所以從「木芍藥」之一的藥草身份，成為唐人眼中的「花中之王」，又因王室貴族、文人名士的珍視與競相購買收藏，形成競相收藏牡丹花的社會熱潮與時代風尚，於是牡丹就被定位為昂貴的「奢侈品」，能擁有牡丹之人，非富即貴，因此它也逐漸被拿來做為象徵身份的物品之一。然後又在「上行下效」的互動傳播下，上層社會之帝王與名士對「牡丹」的愛好，必然影響到下層庶民對牡丹之好奇與嚮往，於是形成當時人民競相爭睹之物。

¹⁶ 唐·舒元興：〈牡丹賦〉，（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九卷，牡丹部藝文一）第554冊之09葉，頁2685。

¹⁷ 徐美霞、徐方方：〈唐代「牡丹熱」淺析〉，《傳承》第2期，2010年6月，頁74。

因此從牡丹的生成與轉變中，可以看到它本為時人對木芍藥的俗呼，卻取代原本之名，經由長時間的演變與空間的移植的流佈，使其從具體實存的、生活觀賞的「自然物」，在少數貴族士人的擁有與喜愛下，變成多數人們競相遊賞，爭相擁有的「牡丹熱」現象。這樣的互動熱潮，所形成的時代與社會風尚，使得牡丹被意象化，成為傳統文化與社會裡，人們用以象徵「富貴」的文化意象之一。準此，「牡丹花」從一個「自然物」逐漸轉換成為文化傳統之「富貴」象徵。然而在王室貴族的推波助瀾下，直接影響到下層庶民社會的流行。因此「牡丹」從具體物的美麗形象，被抽象化、意象化，或被文人寫入詩歌，或被畫師彩繪成圖象，使其成為一種象徵富裕生活的媒材與元素，也確立其在歷史文化情境裡，是一種具有特殊意涵的意象性文化產物。

二、花師的專業培植與改良，助長牡丹熱潮與風尚

在唐人「牡丹熱」的社會現象裡，除了王室貴族、文人名士的愛好，是點燃牡丹熱潮與風尚的因素外，我們從記載「牡丹」的類書裡，可見其乃直至唐代時期，才開始從「芍藥」逐漸轉型成為「牡丹花」的品種，其中唐人競相培育栽種，因而出現牡丹花之花色與品種，走向多元化之品種改良之路。如果只有上層王室貴族與文人名士的喜好，是不可能造成唐代「牡丹熱」之盛況的。因此我們合理的推論：唐人「牡丹熱」現象，並非是一時一刻，或一人所能主導、約制，或創生的文化與社會現象。因此型塑出此一「牡丹熱」現象，乃是結合社會各種不同層面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

因此唐代詩歌與文獻史料的記載：除了詩人寫「牡丹之美」，或批評愛好「牡丹」的社會風氣外，還有一類人，是讓牡丹能從藥草之一的「芍藥」¹⁸，變成「花中之王」的神奇專業人士，當時之人稱其為「花師」。這些特意細心的呵護「培植」牡丹的植物專家，是讓牡丹能被王室與貴族所喜愛的大功臣。雖然「花師」在唐代的社會地位，是被定位在「百工之人」的社會位置，但其神奇的技藝，提供了牡丹之特異的精緻化與多樣化的動因。因此社會各階層之人的參與是型塑出「牡丹文化」過程中很重要的元素。

《龍城錄》中記載到洛陽有一個人名為宋單父的「花師」，其云：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鬥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¹⁹

這段文字記載到宋單父栽種「牡丹」的高超技術，已達「變易千種」的絕藝，所以他用「種藝術」來形容其種牡丹的過人本事。然而因為「不能知其術」所以被皇帝召至驪山，要求他植出各色各樣不同的萬朵牡丹花，並賜與「黃金千餘兩」，宮裡的人都稱呼他為「花師」。我們從這則史料看到幾個解讀的面向：第一，中唐時期的「牡丹」在人為精心栽種下，更加多樣化，更加姿色華麗；第二，它不但吸引了唐人的目光，更吸引了帝王的愛好，於是大手筆要求宋單父

¹⁸ 屈萬里：《詩經釋義》，《詩經·鄭風·溱洧》所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注：芍藥，香草名。」（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1980 年 9 月新一版），頁 127。

¹⁹ 《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3 月），頁 151。

在驪山上種植牡丹，這般貴氣的舉動，同時提供了唐代上下階層的人們一個社會互動的遊賞舞台，想像一下在驪山上種植著各色各樣的萬朵牡丹，除了動人的美麗景象外，花師之高超技藝真是「幻世絕藝」，無人能比。

此外，從史料中可以看到唐代「花師」培育牡丹已成為一項特殊的專長，就如段成式《酉陽雜俎》中所記載：韓愈斥責其姪兒「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²⁰卻被姪兒回嗆說：「某有一藝，恨叔不知。」然後指著階前牡丹花說：「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愈的姪兒就這樣旦暮治其根，經過七天，便出現了「齋紫、礦輕粉，朱紅」等顏色，他還說「恨校遲一月時」。可見若是能夠得「花時」的話，「牡丹花」的顏色將能更加多彩多姿。因此在唐人愛好牡丹的社會行為中，花師們投入研究開發新品種的培植行動，讓其種植「牡丹」的高超技術，變成一門具有藝術性的專業技術外，也提供唐人遊賞牡丹、競種牡丹時，能因牡丹之精緻化、多樣化與多元、多變化的可塑性創造下，助長「牡丹熱」之集體社會互動的媒材。可見若沒有能讓牡丹變化萬千的培植專家，也不可能助長唐代「牡丹熱」的長期流行熱潮，進而形成一種時代性的社會風尚。

因此種牡丹不但是一種專業種植技術，也是一種藝術，如果沒有這種超出常人的藝術能力，是很難提供唐人「牡丹熱」之集體社會互動的流行元素。所以其專業化、藝術化技能，讓文人雅士在競相追逐牡丹之社會互動行為，帶出觀賞者在無約定的不自覺互動過程中，提高了牡丹花的身價外，提升了牡丹花等同於「富貴」的文化意象。因此唐人熱愛牡丹，成為一種社會遊賞的集體行為，因而形成唐人賞愛「牡丹」之社會風尚的行動依據。因此從中唐開始到晚唐時期之間的唐代社會中，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無人不熱愛「牡丹」，這種「牡丹熱」已然成為唐人的一種集體的社會性行為與時代的風尚。《異人錄》記載唐高宗宴請群臣時，觀賞雙頭牡丹，並且相互賦詩，可見集體遊賞「牡丹」花，成為「君臣春宴」時不可少的藝術性鑑賞物。

三、唐人競逐富貴之社會互動與「牡丹」之文化意象的成形

故如前所述，透過帝王與士大夫們愛好牡丹之情的帶領，以及花師的專業性培植與改良的助長，再加上封建社會中「上行下效」的傳播，型塑出「牡丹熱」之社會集體時尚。然而「牡丹」何以能在社會互動中型塑其「富」與「貴」之意象呢？段成式在《酉陽雜俎》裡引錄一首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他並指出「衛公言：貞元中，牡丹已貴。」此處所言之牡丹的「貴」應含有兩層意義：一是經濟價格上的「貴」，一是被視為珍貴之物的「貴」。其實從史料的記載中，我們不難找到唐代貴遊之士，人人競逐牡丹之事蹟，段氏引《通志·昆蟲草木略》中云：「牡丹晚出，唐始有聞，貴游趨競。」以及《唐國史補》中所言：「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吾鋪官園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到唐代貴遊之士的「趨競」社會互動現象，並且這種現象持續了三十餘年，每到春天都是「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因此不惜重金競相買花、種花的社會時尚，也就同時帶出奢侈浮誇的社會風氣。

²⁰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十月二十日），頁185-186。

因此「牡丹花」的美，以及牡丹花「一本有直數萬」的貴，形成長安豪貴們「爭購」牡丹的盛況：一方面呈現出唐人競取牡丹的集體行為，由貴族文人的爭賞，競種中，牡丹已從「嬌貴」的具體自然物，逐漸成為一種足以代表「富貴」的抽象概念，甚至型塑出傳統文化中象徵「富貴」的符徵；另一方面從這種貴遊的集體互動行為，到了唐代貞元年間，更出現了「求奇」、「爭買」等經濟上的「趨競」現象。於是從當上流社會之時尚性互動，逐漸成為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集體互動行為。而「牡丹」這個語詞除了被普遍用來做為象徵「富貴」的吉祥物，或媒介物外，在社會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它由無到有，由稀有到爭相觀賞，再由爭相觀賞與競相栽種中，形成不惜千金只為了買得珍貴的「牡丹花」。例如：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一詩中寫到：「萬物珍那比，千金買不充。如今難更有，縱有在仙宮。」²¹這首詩藉由萬物來襯托牡丹花的珍奇，強調此物只有天上有，人間難得之「珍奇可貴」，而且也呈現出時人縱有千金也「買不充」的遺憾，這種「物稀為貴」的現象，在唐人的社會互動中，更加提高「花王」牡丹身價之高貴。

所以這種社會性爭逐現象，被多數文人寫入詩歌之中，如王建〈牡丹〉詩所云：「此花名價別，開艷益皇都。……一夜輕風起，千金買亦無。」²²這首詩中明白指出千金貴的牡丹花，是何其嬌弱！經不起「一夜輕風」的嬌嫩。唐代詩歌裡不但強調「牡丹」的價高與嬌貴，更呈現出「牡丹」成為唐人標榜「富貴」的憑藉。但同時也引起唐代詩人反省社會中過度競逐牡丹之「牡丹熱」弊端。例如：《清異錄》中有一段記載說到「韓弘，罷宣武節度，歸長安。私第有牡丹，雜花，命斷去之，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為牡丹包羞。」²³這說明了韓弘反省時人過度熱愛「牡丹」的弊病，所以下令斷去私第中之「牡丹」；然而此一行為並沒有改變唐人熱愛「牡丹」的社會風尚。

準此，從這種觀賞「牡丹」的集體社會互動之熱潮中，可以看當時社會的正反兩面反應：一是，就正面意義而言，牡丹文化呈現出唐代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繁華的一面；二是，就負面意義而言，牡丹文化帶出唐人過度沈溺在追逐「牡丹」花的時尚中，因而也反映出唐人走向好大喜功之虛偽陋習。準此，「牡丹」從「花中之王」成為唐代名貴的「觀賞花卉」，且被推崇為「國花」，就如中唐劉禹錫〈賞牡丹〉詩所云：「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²⁴這種「唯有」的牡丹花之美，能在花開時節驚動長安城，可見到了中唐時期的「牡丹熱」現象，已經成為當時社會的集體活動，而唯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國色天香」是時人追逐風尚的共識，這樣的遊賞「花王」牡丹的群體活動，在花師積極投入改良與培育下，已不再只是貴游之士的專有行為，藉由在「上行下效」的傳播推動，它已成為一種全民性的社會行為表現。就如舒元興在〈牡丹賦序〉中所云：

²¹唐·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九卷，牡丹部藝文一）第 554 冊之 12 葉，頁 2690。

²²唐·王建：〈牡丹〉，（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九卷，牡丹部藝文一）第 554 冊之 12 葉，頁 2691。

²³《清異錄》，（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九十二卷，牡丹部紀事）第 554 冊之 23 葉，頁 2713。

²⁴唐·劉禹錫：〈賞牡丹〉，（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九卷，牡丹部藝文一）第 554 冊之 12 葉，頁 2690。

今則自禁閫泊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²⁵

舒元興寫到遊賞牡丹的熱潮，從上層社會之帝王官署，已外延到士人、庶民之家了，這股社會風尚猶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只要一到每年的暮春三月，各地「遨遊之士如狂」顯示了當時的繁華。而這種人人如癡如狂的「牡丹熱」，是使牡丹從貴遊社會的專屬群體活動，普及天下成為百姓們賞春的集體社會性活動。就如《事物紀原》所云：「開元時，宮中及民門競尚之。」²⁶所種「牡丹」與賞「牡丹」是唐人舉天下之大事，因此從當時人的競逐行為到社會觀念的成形，成為每年暮春時節，無論是帝王，官署，士人，或是庶民，都出現集體為賞「牡丹」而癡狂的互動行為，於是使得培育「牡丹」的場域，從宮禁、寺廟，一直傳到民間。而這種遊賞「牡丹」的行為，也從單純社會互動的觀賞行為，成為一種「牡丹熱」的時代風尚。

因此我們推論「牡丹」從仕宦之間的個人與個人相互交遊的媒介，逐漸進入全民的社會生活；從每年三月的賞花活動中，透過文字與繪畫等表現管道，生產出其象徵「富貴」的文化義涵。因此「牡丹」二字與「牡丹」之圖騰，被賦予了「富貴」意象，成為文化傳統中被全民所接受的「富貴」象徵。由此觀之，「牡丹」從實存的自然植物，逐漸成為承載「富貴」文化的一種意象性符號，不但融入唐代詩人的詩歌中，也融入庶民百姓的生活中，例如用以象徵年年「富貴」的年畫圖騰。這種經由唐人競相遊賞牡丹，不惜千萬地爭購牡丹等社會互動行為，變成一種競富行動的過程中，是逐漸形成牡丹之文化意象的主要原因。

肆、轉變：中唐白居易之反思與晚唐李商隱的寄情

本文從社會互動的詮釋視角進入，觀察到唐代有關「牡丹」之詩歌的描述裡，可以看到盛唐「牡丹」詩中，寫其美，寫其珍貴，寫其受人喜愛之熱潮，呈現「花中之王」的美好外，「牡丹」之熱潮與風尚，發展至中晚唐之詩歌時，除了描述「牡丹」之「富貴」意象外，也成為反思批判社會文化的媒介物。就如沈謙所言意象「是指過去的感覺或已被知解的經驗在心靈上的再生或記憶」、是指人們主體感性直覺對客觀物象的反省，由解悟所興發而形成價值判斷的意念。²⁷換言之，唐代的「牡丹」詩是詩人藉由「語言文字」將外在具體的「物象」，經過個人的真實感受，化為語言文字之「意象」。因此從盛唐、中唐、晚唐的詩人筆下，各自呈現出其詮釋「牡丹」之意象的立場與觀點。因此，本文在此的論述，做了兩個面向的選擇：

一是，「牡丹」從被發現，被改良，並在初、盛唐時期人精心栽種與培育下，品種更加多元，並在唐人競趨的社會互動下，型塑出其華麗、富貴無比之意象，也成為傳統文化中象徵「富貴」之意象。故從唐代「詠牡丹」詩中，可以看到在中晚唐時期的詩人活動中，吟詠牡丹已然是一種詩人創作上的「熟題」了。當中除了描寫牡丹之自然「物象美」外，更有對於唐詩「牡丹熱」進行反思與批判者。因此本文預設盛唐牡丹詩，已型塑出象徵「富貴」的意象，所以選

²⁵同註 16。

²⁶《事物紀原》，（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九卷，牡丹部紀事）第 554 冊之 23 葉，頁 22712。

²⁷沈謙：《文學概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10 月初版三刷），頁 170。

擇將焦點放在中晚唐的牡丹詩意象的社會文化的反思。

二是，中晚唐時期詩人很多，但礙於本文的篇章限制，因此本文選擇中唐白居易與晚唐李商隱做為詩人寄情的研究對象。除了因為這兩人的牡丹詩具有意象變遷的特殊性外，他們在詠「牡丹詩」時，除了物象與現象的描述外，更藉由牡丹所載具的「富貴」象徵與意象，做為其「感物起情」之類比聯想的媒介。並且將眼前所見之貴遊人士，如何不惜重金競買下牡丹花，如何競相種植牡丹花以為風尚，如何造成過度沈溺追逐收藏「牡丹」的社會亂象等等描述，做為詩歌中批判這種過度「牡丹熱」的愛好，所出現之「好大喜功」、「虛偽鄙陋」等社會亂象的根據。

其實在唐人熱愛牡丹的社會互動行為中，不自覺地讓「牡丹」從一種具體的自然物，逐漸成為一種自覺地運用，做為象徵「富貴」的抽象符碼。在唐人「牡丹」詩中，除了直寫「牡丹」之美艷與嬌貴外，中唐以後的文人，更藉由惜花來抒懷，藉由詠花來諷喻時事，藉由託物來寄託個人之情。例如：中唐白居易〈和錢學士白牡丹〉詩所云：

城中看花客，旦暮走營營。素華人不顧，亦占牡丹名。開在深寺中，車馬無來聲。惟有錢學士，盡日繞叢行。憐此皓然質，無人自芳馨。眾嫌我獨賞，移植在中庭。留景夜不暝，迎晨曙先明。對之心亦靜，虛白相向生。唐昌玉蕊花，攀玩眾所爭。折來比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為輕。始知無正色，愛惡隨人情。豈惟花獨爾，理與人事并。君看入時者，紫艷與紅英。²⁸

從這首〈和錢學士白牡丹〉敘事詩裡，我們可以看到白居易刻意地點出「城中看花客」從早到晚遊賞牡丹花的社會現況，這首寫開在寺廟的「白牡丹」乏人問津，惟獨錢學士「盡日繞叢行」，憐其皓白之質地，憐其無人欣賞，卻還能「自芳馨」，這樣的「白牡丹」在錢學士的眼中，徹夜不眠，對之心靜，且獨賞其「虛白相向生」之美。白居易認為其實沒有什麼顏色是牡丹花的正色，所以他說「唐昌玉蕊花，攀玩眾所爭」，而「白牡丹」反因多而為人所輕。可見在物以稀為貴的前提下，就只能「愛惡隨人情」而已，然而在白居易託物來寄情下，感歎著「豈惟花獨爾，理與人事并」！這正是社會詩人白居易，觀察唐人「牡丹熱」的社會互動及其弊端之後，提出其個人對牡丹的不同的審美感受，點出文人「懷才不遇」、「等待知音」的期待情懷。

此外，本文在此點出晚唐李商隱詩在用典的運用上，他是預設了「牡丹」的普遍性象徵意象，做為他感物起情的基礎，如其在「錦幃初卷」這首七律〈牡丹〉詩中云：

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折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薰。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²⁹

李商隱在這首詩中，運用了「衛夫人」、「越鄂君」、「戚夫人」、「石家燃燭」、「荀令香爐」等典故類喻「牡丹」，然而他除了描述牡丹之受人喜愛、姿態優美、光彩艷麗、香氣濃郁等特質之外，

²⁸唐·白居易：〈和錢學士白牡丹〉，（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九卷，牡丹部藝文一）第 554 冊之 12 葉，頁 2691。

²⁹余恕誠與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臺北：洪葉文化，1992 年），頁 1548。

每一個典故所營造出來其「富貴」的普遍性意象，做為其「感物起情」的立基。又如「壓逕復緣溝」這首五律〈牡丹〉裡，所寫「鸞鳳戲三島，神仙居十洲」，亦是藉由牡丹為「富貴」的普遍性象徵符碼，做為聯想的依據，因此與詩中之「鸞鳳」（是指傳說中的鸞鳥與鳳凰）這個符碼之「富貴」象徵意義，產生「類比聯想」的意象。至於「三島」與「十洲」可泛指仙島仙境，然而李商隱用「三神島」³⁰與「《十洲記》³¹之「十洲」，已非實指仙境而言，應是藉由此一「象徵符碼」來寫牡丹「富貴仙氣」的文化意象。又如李商隱〈僧院牡丹〉詩中，也是藉用「象徵符碼」的運用來反思社會文化現象與寄託情懷，故其云：

葉薄風才倚，枝輕霧不勝。開先如避客，色淺為依僧。粉壁正蕩水，緜幃初卷燈。傾城惟待笑，要裂幾多繒！³²

這首詩所指「僧院」，本屬於一個特殊的場域，在普遍性的「象徵」意象中，「僧院」是「清修」、「清靜」之地，因此生長在寺院的牡丹花「開先如避客，色淺為依僧」，就現實面而言，僧院裡的白牡丹，開得早，顏色淡，本來都是自然物的實存狀態，但在李商隱的妙筆下，除寫其物象美之外，更藉由「傾城惟待笑，要裂幾多繒！」做為其擬人化的寄情與省思，讓象徵「清修」的僧院與象徵「富貴」的牡丹，形成強烈對比。

由此可見，中唐以後的「牡丹」詩裡，越來越多融入了牡丹象徵「富貴」的意象。詩人從「牡丹」用以代表或暗示當時的一種集體性的社會互動中，點出其「富貴」的理性聯想，或約定俗成的意象性共識。因此「牡丹」由一種具體自然物象之美，被轉用成為一種文化象徵符號（意象）。這種文化意象，從被創造出來到相互因襲，形成代表「富貴」之傳統記憶性象徵符碼。中晚唐時期，更將此一象徵符碼，運用在反省唐代社會文化型態的媒介，因此「牡丹」成為詩人妙筆下，象徵社會「名位」、仕途「得失」的指標性象徵物。這種「象徵符碼」的運用，也成為李商隱牡丹詩的意象特色之一。因此晚唐李商隱的牡丹詩，擅長結合眾人對「牡丹」是華麗與富貴的期待視域，並在此一視域融合下，以牡丹做為抒發情感的媒介物，將牡丹之實體「虛化」，成為他「對應當前遭遇」或「追憶過往」的意象依據。如李商隱〈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

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悵臥遙帷。章臺街裏芳菲伴，且問宮腰損幾枝？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萬里重陰非舊圃，一年生意屬流塵。前溪舞罷君迴顧，併覺今朝粉態新。³³

李商隱在這二首詩中，除了運用牡丹「富貴」的普遍性象徵外，更進一步經營出其個殊性的象

³⁰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第六》：「《史記·封禪書》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七十九年三月六版），頁1369-1370。

³¹同註29，〈十洲記〉：「四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充洲、鳳麟洲、聚窟洲、流洲、生洲。」頁1555。

³²同註29，〈僧院牡丹〉（錦帷初卷），頁1556。

³³同註29，〈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臺北：洪葉文化，1992年），頁270-271。

徵指涉，讓人不自覺地聯想到長安牡丹熱的盛況，因此在兩地牡丹的對比下，長安牡丹之貴氣逼人，自然地帶出牡丹受人寵愛的「得意」景象，藉此檢視這組詩歌時，李商隱以特定地點（回中、長安）、特殊情境（為雨所敗、先期零落）來寫牡丹，讓人在時間（今昔）與空間（回中與長安）的對比，牡丹不自覺地成為一種「記憶」符碼，成為象徵李商隱個人創造「得意」與「失意」之意象。

歷來許多學者認為回中殘敗的牡丹，是李商隱自比的符碼，讓人聯想到李商隱遭人「排擠」的處境；當他懷想「曲江池畔」、「章台街裡」備受呵護的牡丹越多時，就更是對比出「回中牡丹」的殘損意象，這就是他藉由牡丹之「富貴」、「嬌媚」的物象描述，來呈現牡丹之所以能「富貴」、「得意」，並不是「牡丹」自己本身的因素，而是受外在局勢，生長環境、人們好惡所困；因此牡丹不會永遠地富貴，一旦易時易地後，富貴不再、得意不再，讓人不自覺地將「殘損」的牡丹與「失意」的人（李商隱）聯想在一起，這就是詩人透過「象徵符碼」來寄情的運用外，更具其對社會文化的省思。

伍、結 論

綜前所述，唐人的「牡丹熱」呈現出的社會性文化意涵：其一，唐代「牡丹」從無到有，甚至從宮庭到民間爭相遊賞花中之王，培育花中之王，搶購花中之王的行為，讓牡丹成為當時人與人之間互動往來的媒介物。這種的社會互動影響了彼此的態度、情感，甚至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徵符碼，或自我期望的行動目標。其二，「牡丹」本為自然植物，但卻被逐漸符號化，成為唐代詩人藉以抒情寄意的詩歌元素，也成為畫家筆下彩繪吉祥富貴之圖騰。因此牡丹除了是「富貴文化」、「貴遊文化」之象徵物外，更是中晚唐詩人的眼中，藉由反思「牡丹熱」之社會時尚，批評貴族人士競富逐貴的書寫媒材。透過唐人的詩歌紀錄，讓我看到當時之人的「牡丹熱」現象，他們藉由吟詠「牡丹花」的過程，或描述「牡丹」之美麗，受人喜愛的現象，或透過「牡丹」象徵富貴，以批判時人過度「牡丹熱」所造成的社會互動亂象，或反省「牡丹熱」之浮誇的負面文化現象。因此此一「牡丹熱」的社會、文化熱潮，在帝王與文人雅士的推波助瀾下，從一個自然物變成象徵「富貴」的文化意象，直至今日它依然是華人社會中一個具傳統文化之「富貴」義涵的共同象徵。

此外，由於唐代牡丹詩之數量非常多，而本文又是以社會互動為視角的文化面向論述，並非是單純的文學性詩歌分析，故僅選擇中唐社會詩人白居易，在其詩中反思世人牡丹熱之社會互動現象，進而提出其對社會的反思與批判，以及晚唐李商隱之詩歌中，對於「牡丹富貴」之文化意象的反思與寄情，李商隱在運用「牡丹富貴」之普遍性象徵意象中，進一步做為其個性意象的反思與寄情。可見一種「牡丹」文化意象的產出，從初、盛唐的培育、栽種與遊賞，藉由集體社會互動的行為，使其由無到有，由一般到珍貴，由自然物而逐漸型塑成為文化產物，並且被中晚唐詩人眼中反思社會亂象，或寄情個人遭遇時的創作元素，透過他們的主觀認知，讓我們更瞭解到唐代「牡丹」熱潮中，是存在著集體與個人之有趣的社會互動現象，在這種社會現象的變遷中，逐漸形成「牡丹」的文化傳統。

因此本文從「社會互動」的角度，觀察唐代文人熱愛「牡丹花」的熱潮。這種集體「社會互動」行為，在唐代的相關文獻史料中均有記載，這種「牡丹熱」現象，呈現出唐代文士除了競相追求「牡丹」外，更將其互動心得與見解，書寫在詩歌之中，甚至成為中晚唐詩人反思當時過度追逐「牡丹」，追求「富貴」的社會亂象。可見在唐代王室貴族與文人名士熱愛牡丹，點燃牡丹熱潮與風尚，以及花師的培育與改良，助長牡丹熱潮與風尚等社會互動，是型塑「牡丹文化」的要素。同時從社會互動的模式，可提供我們重新以社會、文化的視角，來檢視，或反思中國傳統文學中，所承載之社會情境，及其在生成與演化中的文化意涵。

參考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第六》。楊家駱主編，鼎文書局，1990年三月六版。
-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十月二十日。
- 唐·舒元興。〈牡丹賦〉。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草木典，第二百八十九卷，牡丹部藝文一，第554冊之09。
- 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花釋名第二」。百川學海，正光書局，1998年九月初版。
- 屈萬里(1980)。《詩經釋義》。《詩經·鄭風·溱洧》，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 余恕誠與劉學鐸(1992)。《李商隱詩歌集解》。臺北：洪葉文化。
- 詹火生(1993)。《認識社會學》。臺北市：正中書局。
- Donald Light, Jr. Suzanne Keller 合著 林義男譯(1994)。《社會學》。臺北市：麥格羅出版社。
- 田志明、張劍光(1994)。〈唐代的牡丹欣賞熱〉。《雲南教育學院學報》，第11卷第三。
- 張艷雲(1995)。〈唐代長安的重牡丹風氣〉。《唐都學刊》第11卷(總第45期)。
- 陳昌寧(1996)。〈唐宋間牡丹熱的地理變遷〉。《天中學刊》第11卷(增刊)。
- 彭懷恩(1998)。《社會學Q&A》。《風雲論壇》。
- 葉永文等編(1999)。《社會學理論Q & A》。臺北市：風雲論壇。
- 王健(2000)。〈唐代長安的牡丹熱〉。《風景名勝》。
- 楊靜(2002)。〈唐代牡丹詩與牡丹文化〉。《荷澤師專學報》第24卷第3期。
- 沈謙(2003)。《文學概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George Ritzer, Douglas Goodman 柯朝欽 鄭祖邦譯(2004)。《社會學理論》。臺北：麥格羅出版社。
- 李雄、李富軒(2005)。〈國色天香話牡丹〉。《歷史月刊》206期。
- 劉航(2005)。〈牡丹：唐代社會文化心理變遷的一面鏡子〉。(《學術月刊》)。
- 黃崇鐵(2006)。〈牡丹的吉祥圖意與其象徵意義〉。《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53期。
- 顏崑陽(2008)。〈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的文化原料性、不定式文本再製與價值兌現〉。第三屆「海峽兩岸中華文化發展論壇」。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與淡江大學等主辦。江蘇省連雲港舉行。
- 涂美婷(2008)。《唐代牡丹文化與牡丹詩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97學年度碩士論文。
- 白茹冰(2009)。〈唐代牡丹文化初探〉。《農業考古》。
- 徐美霞、徐方方(2010)。〈唐代「牡丹熱」淺析〉。《傳承》第2期。

